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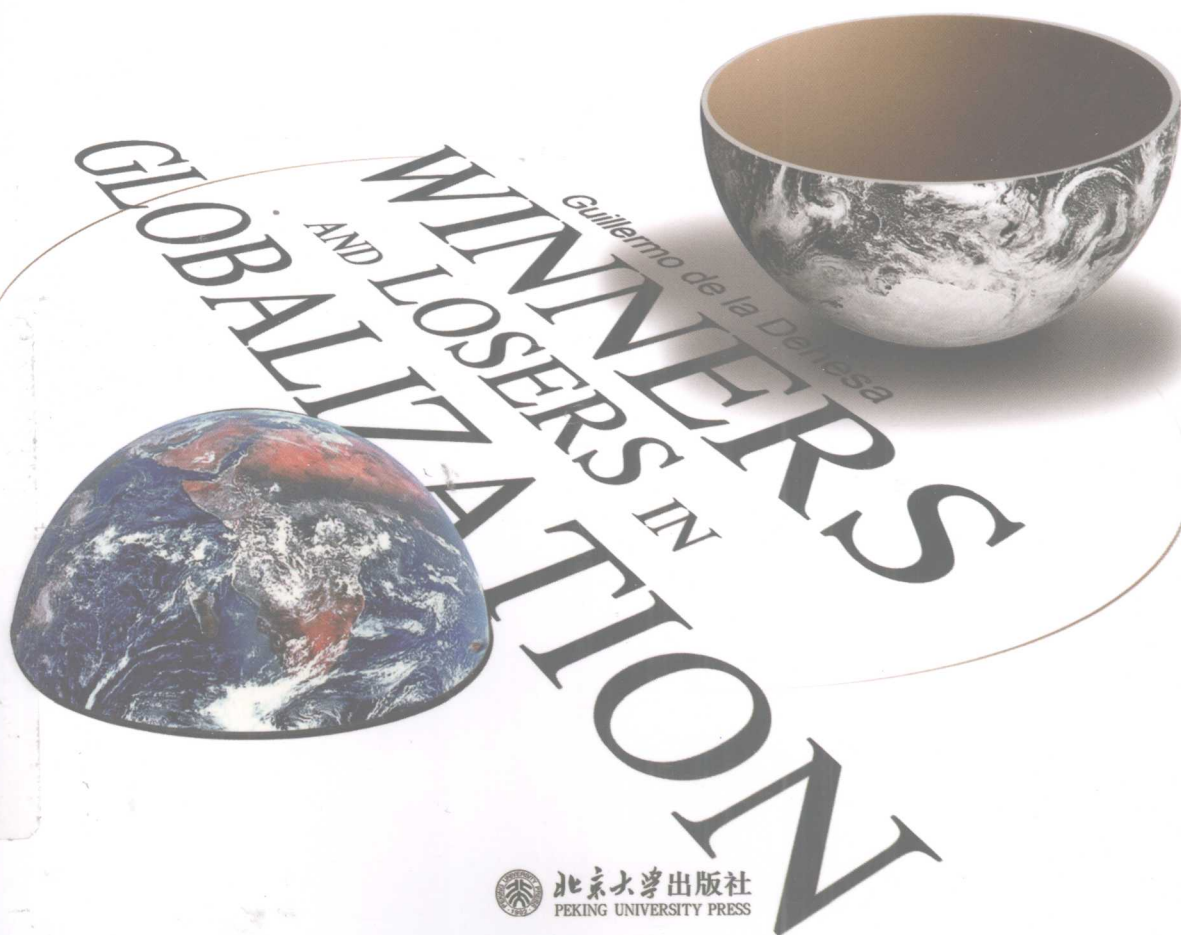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辛勤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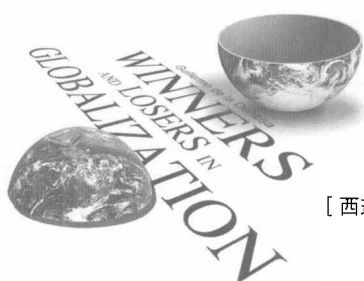
全球化博弈

谁在承担全球化的成本？谁在获得全球化的收益？

〔西班牙〕圭拉姆·德拉德赫萨（Guillermo de la Dehesa）◎著

董凌云◎译





全球化博弈

[西班牙] 圭拉姆·德拉德赫萨 (Guillermo de la Dehesa) ◎著
董凌云◎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8—31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博弈/(西)德拉德赫萨著;董凌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
ISBN 978-7-301-15624-7

I. 全… II. ①德…②董… III. 国际化—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3148 号

译自 *Winners and Losers in Globalization* / edited by Guillermo de la Dehesa. — 1st ed. Copyright © 2006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except as permitted by the UK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书 名: 全球化博弈

著作责任者: [西班牙]圭拉姆·德拉德赫萨 著 董凌云 译

策 划 编 辑: 徐 冰

责 任 编 辑: 谢 超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5624-7/F · 2262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 子 邮 箱: em@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9.75 印张 172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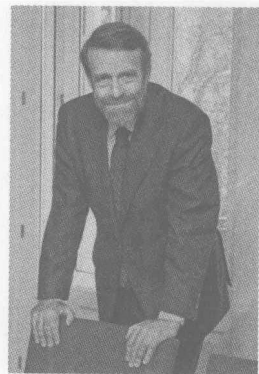
定 价: 27.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中文版序言



中国的全球化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全球化速度超过中国。不仅如此，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重要引擎。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短短 30 年间，中国从一个高度封闭的经济体变成了一个开放国家。中国的对外贸易额自 1978 年以来翻了 100 倍，目前是仅次于德国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自 1982 年以来翻了 150 倍，在 2007 年达到 835 亿美元，高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全世界名列第六。今天有大约 4 000 万中国人生活在世界 160 个国家，该规模超过其他任何族裔。

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迅速而广泛的对外开放，得益于她所推行的各项重大改革政策。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但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使大量人口脱贫。中国贫困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中型或大型人口规模的国家。

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中国的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全球化的原因、内涵及其对经济、社会、政治等诸方面的影响。

圭拉姆·德拉德赫萨

2008 年 12 月 22 日

图片来源：<http://www.guillermodeladehesa.com/>

序



全球化是一个会激起超乎寻常的强烈情绪的话题。或许这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超越国家疆界的经济体系，它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去体味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真正感觉。如果我们认为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全球化创造财富的力量，特别是它快速提升贫穷国家进入现代化世界的力量，会让我们对它合掌激赞。但是如果我们本质上是不信任市场的，乃至对一个由个人利益驱动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也不愿接受，那么展望全球化这样一个超越国家政府掌控的市场经济体系只会让我们充满恐惧。

由于全球经济的话题是如此充满争议，那些试图对此提供解释的人们往往会被质疑他们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格。如果由一个经济学家来撰写关于全球化的文章，他可能会被认为缺乏对现实世界的了解。如果由一个商界人士来写，则他可能会被认为不具备对经济中宏观力量的理解，或者只会考虑利润因素而忽视人的需求。如果由一个政界人士来写——谁又会相信政客的话呢？几乎任何一个想对全球化现象说些什么的人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知识上或资历上的缺陷，因而至少潜在地使他的观点变得令人生疑。

但是偶尔会有像圭拉姆·德拉德赫萨这样的人，他的知识和经验跨越了通常的疆界，那些老生常谈的质疑对他并不适用。德拉德赫萨先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银行家，他当然不能被认为是不了解现实世界的。但他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位经济学家，多年来他对于欧洲和国际经济问题发表了很多重要的言论。我最初认识他是通过高端经济会议圈子内的活动，其中在欧洲的活动主要是由德拉德赫萨先生目前担任主席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承办的，而与国际金融相关的活动则是由诸如三十人集团这样的组织承办的。这还不是全部，德拉德赫萨先生也具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丰富经验，并且能够为民主和正义不惜冒事业甚至个人风险。他总是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尤其是为那些不如他幸运的芸芸众生。正因如此，我们相信他会公平地评估全球化博弈的成败得失。

换句话说，德拉德赫萨先生是一位你可以相信其动机的人，而且他的知识和经验的广度在这个领域乃至其他领域也堪称罕见。

我不指望本书可以平息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在这个话题上有太多的现实不确定性,也有太多固执己见的人,对他们而言,任何推理和论证都难以撼动其成见。但是德拉德赫萨先生的这本优秀著作或许可以降低这场争论的火药味,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更好地思考今天的全球新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图片来源:<http://wiki.mbalib.com/wiki/Krugman>

导言

全球化一词已成为政客、商人、工会领袖和经济学家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时髦用语。然而同时，全球化也已成为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替罪羊。对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官员和民众而言，全球化是造成金融危机并使其蔓延的罪魁祸首。当一些颇具前景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或政治上的弱点稍一冒头，国际资本就急速抽离，由此触发金融危机。而对发达国家的许多工会人士和党派而言，全球化在减少工作机会和扩大收入差距上难逃其责。国际竞争带来的是工资低廉和工作条件恶劣的国家的“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同时也有很多政府指责全球化正在使国家主权迅速丧失。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影响力的攀升，国家和政府日趋无力。这一系列对待全球化的态度被称为“全球化恐惧症”(globaphobia)，其症状在1999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高峰会议时爆发到顶点。西雅图会议试图启动的贸易自由化千禧年回合以失败告终。之后全球化恐惧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举行的每次会议，甚至在达沃斯年会期间都有发作，但所幸其杀伤力在不断减弱。今天对全球化的抗议活动已不像当初那样频繁，也更多地通过政治或直接途径来组织。有些抗议者转而去关心其他问题了，如伊拉克战争。

许多左翼或右翼政客一边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一边对全球化进行批评。诸如英国的约翰·格雷(John Gray)那样的保守思想家和诸如美国的威廉姆·格雷德(William Greider)那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对全球化的抨击并无多大差别。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全球化的一般进程，虽然有些人质疑金融全球化的必要性，或是对是否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监督全球化进程心存疑虑。印度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 1998, 2004)或许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巴格瓦蒂是一个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热烈拥护者，但他反对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巴格瓦蒂相信资本的自由流动必定会引发金融危机，从而使人们转向反对贸易自由化，而后者被他视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国家之间收入趋同的关键。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曾经强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资本流通完全自由化政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应对大量短期资本流入，所以它们遭受了从亚洲开始并蔓延到其他地区的那场金融危机。而那些没有对国际资本流动开放的亚

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则躲过了这场危机。巴格瓦蒂(2004)认为“华尔街—财政部联合体”(Wall Street-Treasury Complex)要对亚洲金融危机负责。他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错误政策中退出来的决定欢呼,但他认为这一决定来得太晚了。

其他颇具声望的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1999a)和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 1999a)既支持贸易全球化又支持金融全球化,但主张有选择地采取一些暂时性措施来控制短期资本流动以避免危机的爆发。令人困惑的是另一位受人推崇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 1999),他既反对资本流动自由化(包括浮动汇率),又反对贸易全球化,这使他突兀地站在了反全球化的阵营里。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2003)原则上不反对全球化,但他强烈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对全球化的解释以及它们在发展中国家采取的相关政策。斯蒂格利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谴责尤为激烈,认为它在一些国家实施其项目时采取了错误政策来贯彻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原则”(Washington Consensus Principles)。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中某些原则在定义上存在错误,而另一些原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指导建议的影响下在许多国家被错误地实施。然而,不管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如何不同,不赞同全球化的只是极少数。但很多经济学家对目前这种缺少在世界层面上监督和管理的全球化进程表示不满。

在本书中,笔者试图以学术的、客观的和冷静的分析向读者展现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并具体阐述全球化对个人、企业、政府和国家的经济影响。本书会评估全球化对劳工市场、金融市场、全球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以及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趋同的影响。要阐明这场发生在明显占少数的全球化喜好者(globaphiles)和大多数的全球化恐惧者(globaphobes)之间的充满感情色彩的争论,客观性和经验证据至关重要。所以本书会对有关全球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作一个简单的文献综述。这些研究是目前最前沿的并且涉及全球化的方方面面。笔者希望这会为不熟悉经济学的读者提供帮助。

让我开门见山地指出,总体而言,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和世界趋同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分配是不平均的。就像所有的经济演变过程一样,全球化过程中会有赢家和输家。但我确信全球化的赢家要远远多于输家。

一方面,通过创新技术的扩散,全球化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促进了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全球化使生产过程、劳力市场、政治群体甚至整个社会产生分化。全球化既带来了技术创新等正面影响,也带来了金融危机等负面

影响。我想强调的是,全球化产生的正面影响要远比负面影响重要得多。

由此看来,无论是全球化恐惧论还是全球化喜好论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全球化既不像有些人赞美的那样能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福利,也不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是罪恶之源。在经济学中没有绝对只有相对。我们所处的全球化进程对世界经济整体产生的积极影响要远大于消极影响。然而如果我们想避免全社会再一次出现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那就必须尽力减少全球化对某些受它冲击甚至排斥的国家和个人的负面影响。1914年曾爆发过一次全面的反全球化运动,当时全球化进程已经发展了44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后,人们发现停止全球化进程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现实世界中,全球化的主要输家是那些落后的、没有能力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和人民。这些国家缺少具有可信度的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而全球化的主要赢家正是那些通过开放吸引了外商、外资和外国技术的国家。因而,全球化的主要输家并不是像一些孤陋寡闻的所谓专家们所说的那样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恰恰相反,它们是“缺乏全球化的受害者”。

当前的情况是,市场和企业对全球化的引领作用远远大于政府。与之前几十年间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进步。市场和政府都是必需的,无论谁担任引领者都不可避免会犯错误。但市场一般会比政府更快更好地纠正错误。然而,市场代替政府成为引领者带来了新的矛盾。一个矛盾是,市场是一系列复杂的个人决策的结果,而民主则是多数人集体选择的结果。另一个矛盾是,市场发展得好的地方正是政府干预得少的地方。然而任何国家都必须重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全球化需要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和保证社会和谐。正如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1999)指出的:“目前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是一场尚未完成的革命。它们缺乏特定的社会管理。当前的动荡局面将继续下去,直到一个新的全球社会管理体系被建立起来为止。”

在2000年1月的达沃斯高峰论坛上,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对上述问题作了很好的阐述。布莱尔认为新世纪提供了创建开放的世界经济和全球社会的良好契机,但完成这项任务的前提是将全球化带来的空前发展机会建立在伦理和责任的基础上,防止某些国家和个人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这意味着国际社会要承诺去帮助那些受债务问题、种族问题或环境问题困扰的国家和人民。布莱尔总结道,不同于20世纪针对意识形态教条的斗争,21世纪将是一场针对实用主义理念的斗争。

克林顿对全球化进程的评估与布莱尔类似。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家庭都能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工业化国家必须保证穷人和弱势群体不被忽略,保证所有工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和专业培训以适应新技术的应用。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努力缩小贫富差距,确保政

府机关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后者对于吸引外资来帮助发展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具有关键作用。对那些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能提供的帮助是有限的。不过,发达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减少债务、开展贸易、提供投资以及支持教育和培训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笔者看来,布莱尔和克林顿在达沃斯的演讲很清楚地总结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本书是我利用周末和假期时间完成的。我要感谢我的朋友,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为本书作序。我希望本书能够激励尽量多的读者加入到这场关于全球化的重要辩论中来。

圭拉姆·德拉德赫萨

目录

中文版序言/1

序/1

导言/1

第一章 什么是全球化? /1

第二章 全球化与经济增长/7

第三章 全球化、收入趋同和收入分配/21

第四章 全球化、就业和劳动力市场/37

第五章 全球化与跨国公司/53

第六章 全球化与国家和政府/65

第七章 全球化与经济政策/75

第八章 全球化与汇率/83

第九章 全球化与金融危机/91

第十章 全球化与文化/127

第十一章 谁是全球化的赢家? 谁是输家?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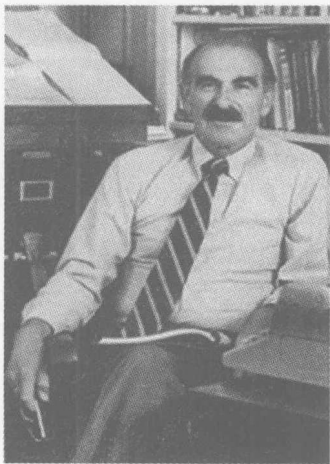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众多市场实行自由化、开放和国际整合的动态过程，涉及从劳动力市场到商品市场，从服务市场到资本及技术市场等广泛的领域。全球化并非新生事物，它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发展至今。如果各国政策允许，全球化进程还将持续多年直至完成。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轮全球化浪潮。1870—1914 年间，类似的过程也曾发生，其激烈程度不亚于这一轮。20 世纪初开始了全球市场的整合。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传播以及经济大萧条等跌宕起伏的几十年后，这一过程又重新启动了。新一轮的全球化看起来更具持久力。第一轮全球化只持续了 44 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戛然而止。而本轮全球化已经超过了 50 年，并且比前一轮有更坚实的基础。

但愿这次全球化进程不会像上一次那样悲惨地结束。上一次全球化结束的后果是从市场法则下的和平经济竞争退化成政治和军备竞争以及军事冲突。这样的结局太糟糕了。在战争和全球化中都会有赢家和输家，全球化的输家不至于丧失生命，但也会失去很多。全球化最终归结为一点，它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各国通过自由贸易从比较优势中获利；在可接受的风险下，向回报率高的地方投资的自由；选择任何国家和地区开店的自由，不管开店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还是更大的市场份额，抑或是个人追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环境。

商业经济学家被公认为是第一批使用全球化一词的人。西奥多·李维特（Theodore Levitt, 1983）就是其中之一。李维特在关于全球化市场的文章中描述了一个商品生产销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不再是基于生产周期，而是



西奥多·李维特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全球化”

图片来源:http://wiki.mbalib.com/wiki/Theodore_Levitt

被一个新概念即全球市场所替代。第一阶段,新产品在最发达国家销售直到被淘汰;然后这些产品被限制仅出现在次发达国家,直到下架。第二阶段,同样的商品用同样的方法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这样做可以降低成本,并且使消费者偏好在全球范围内趋于一致。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90)也用了全球公司的概念,以此和跨国公司的概念相区别。跨国公司是指在多国经营业务,但并未试图通过战略政策整合这些业务的公司。而全球公司会通过协调整合各国业务的全球战略,使公司作为整体远胜于它的各个分部。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1990)更进一步地定义了全球公司。这类公司完全摒弃了国籍,在全球范围以无国籍身份经营业务,国家所设的监管和它们基本无关。全球公司的研发活动、财务策略、人力资源政策都是从全球层面展开的。雀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家瑞士公司最高层的10个管理人员只有两个是瑞士人,其余来自5个不同国家。雀巢在150个国家有业务,它在瑞士的业务反而是微不足道的。

可以这么说,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是在多国有经营活动的大型跨国公司,包括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它们带动了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并整合了全球市场。然而,如果不是技术进步和政府政策赋予了它们全球经营自由,这些公司也不可能引领全球化。

全球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呢?第一点毫无疑问是技术。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成本。国际空运成本从1930年的每吨100美元降至2000年的每吨30美元(以1990年美元计)。而航空业每位乘客的利润从1930年的100美元降至2000年的10美元。再者,空运和冷冻技术的提高使以前一些非贸易产品如易腐烂的鱼、虾、水果、蔬菜、花之类变得可贸易交换了。一个从纽约打到伦敦的5分钟电话,在1930年要300美元,在1960年降到50美元,而如今只要几美分。卫星通信的收费由1975年的100美元降到2000年的不到1美元。电脑上网费由1975年的每秒100美元降至1995年的每秒1美分,而如今只要每秒0.001美元。全世界网民的人数在1990年占总人口的1%,2000年占14%;美国网民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则高达55%,欧盟是45%,日本是37%,亚洲新兴国家是18%(IMF,2005)。

道路、航运和海运也在以同样快的速度发展。海运的成本以小麦价格的百

分比计,从 1830 年的 80% 降至今日的不到 10%。不仅交通成本在下降,交通运输在世界商品贸易中的重要性也在下降。贸易中需运输的商品从原材料和未经加工的农产品更多地变成了轻质材料和占地面积小的成品。也就是说,现今的贸易产品具有更高的单位价值,加上运输成本的降低,后者与前者之比降低了。所有这些都大大减弱了国家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然障碍,降低了商品、服务、人口、资本、技术及信息在各国之间的流通成本。随着各国经济的国际化,世界在不断缩小,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在不断增加。

全球化进程的第二个决定因素是商品服务贸易和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公约在多边层次上促进了自由化在各成员国的实施,而各国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单边、双边和区域协议也使之得以加强。其结果是世界平均关税税率下降。在 1980—2000 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从 30% 降至 12%,发达国家的关税从 10% 降至 4%。全球贸易额(包括商品和服务)占 GDP 的比重由 20 世纪 70 年代的 20% 上升至 2003 年的 55% (IMF, 2005)。

全球化的深度

以上情况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已取得了全面和深入的发展,恰恰相反,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是对外贸易量与产值之比。虽然这一比例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持续稳定上涨(也就是说,国际贸易量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产值的增长速度),但目前也只是稍稍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的水平。出口贸易占世界产值的比重在 1913 年达到了一个高峰,直到 1970 年才被超越。日本在 1913 年比现在更开放,那时日本进出口总量占 GDP 的 30%,如今只占 22%。英国则比那时开放了,英国的贸易量和 GDP 之比从 1913 年的 47% 上升到了今天的 57%。法国、德国、美国也更开放了,它们今天的贸易和 GDP 之比分别是 51%、69% 和 26%。

一般而言,国家越大,贸易量占 GDP 的比例越小。在诸如美国、欧盟和日本这样的大经济体,贸易量和 GDP 之比在 22%—26% 之间。在诸如荷兰、比利时和爱尔兰这样的小国,贸易量和 GDP 之比高于 100%。我的祖国西班牙则经历了一场剧变。在 1918 年,西班牙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为 24%,在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的 1959 年,这一比重急速降至 9%。从那时到现在,这一比重又上升到了 60%,高于法国和意大利。从全球范围看,世界贸易额自 1950 年以来翻了 16 倍,而世界 GDP 同期只增长了 5 倍。日益开放的趋势得益于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的降低。在 1913 年的全球化高峰期,欧洲的平均关税大约是

12%。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合组织国家的关税曾达到 22%,而今这些国家的关税不到 5%,这一成就就要归功于关贸总协定的多次谈判。不过,经合组织国家针对不同产品所设的关税率差别很大,针对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关税远高于平均关税水平。这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难以进入经合组织国家的市场。

另一个衡量全球化进展的方法是观察同一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趋同度。在一个完全全球化的世界中,同样产品其价格在去除地方税收、交通和保险成本后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然而,当今世界距离这种完美状态还很远。套利交易,即在价格低的地方买入同时在价格高的地方卖出的行为,应该会拉平价格。但经济学家们一次次吃惊地发现,价格拉平的结果没有如期出现。对这一现象通常的解释是同类商品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品牌、营销、零售、售后保修以及客户服务也都会影响价格。汇率亦是导致价格差异的因素之一。然而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非品牌和无差异商品中,价格差别同样存在。

实际的情况是各国之间的差别是显著的,即使是欧盟内部也是如此。例如同一款汽车的税前价格在有些欧盟国家会比其他欧盟国家高出 3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某些国家的配销更有效率,也可能是因为各国消费者的偏好不同,如对国产汽车的偏好,也可能是因为消费者没能做价格比较。不管是何种原因,跨国公司运用针对不同国家的价格歧视策略,能够获取更高的利润。欧元的使用使商品统一由欧元标价,价格比较变得更加容易,欧元区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别在逐渐地缩小。

跨国市场比国内市场更难整合,即便是两个相邻的国家亦如此。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尽管两国有四千多公里长的边界,并且几乎没有任何贸易壁垒,美加之间的贸易额要比加拿大国内省际贸易额小 20 倍。两国使用不同币种或许可以帮助解释它们对国内商品和服务的偏好。

主要由于技术的进步,金融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的速度要快于商品和非金融服务贸易。但金融一体化的进程还远未完成。衡量金融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方法是观察国际资本净流量。资本出口国拥有储蓄盈余,在它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经常账户是盈余的。资本进口国的储蓄不足,它们的经常账户呈赤字。在 1870—1914 年的第一轮全球化时期,英国年均资本输出额是 GDP 的 5%,之后曾达到 10%。在前几年,世界上经常账户盈余最大的日本的资本输出额仅为 GDP 的 3.5%。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净资本外流量仅为 GDP 的 2.5%。

另一个衡量金融全球化程度的方法是比较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直接投资。在当今的经合组织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是国内投资的 6%。而英国在 20 世纪的前 13 年,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与国内投资相同的数额。只是到了前几年,在墨

西哥、巴西和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国内净投资的 20%。

然而,如果以各国的外国总资产和总负债来衡量,金融全球化的进展是迅速的。在 1970 年,工业化国家的外国资产占其 GDP 的 25%,外国负债占 28%;如今,这两个比率分别上升到了 210%和 225%。在新兴市场国家,同期外国资产由 GDP 的 9%上涨到了 72%,外国负债从 27%上涨到了 95%(IMF, 2005)。

在完全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全球的利率应该是趋同的(扣除汇率风险),这在目前尚未发生。换句话说,汇率未能体现或完全抵消短期利率的差别(如利率平价理论预计的那样),也未能体现长期通货膨胀率的不同(如购买力平价理论假设的那样)。目前各国利率之间的趋同虽然进展缓慢并常有波动,但方向是正确的。在主要的经合组织国家之间,实际利率差距的标准差已从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 12%降至 90 年代的 1%(IMF, 1997)。

无论如何,金融全球化在以令人满意的进度发展。在 1980—2003 年间,全球实际 GDP 以年均 3.5%的速度增长,而以实际量衡量的债券和股票交易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25%。外汇交易额的年增长率是 24%,国际贷款额的年增长率是 8%。同期外国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是 9%,而商品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率是 7%。如果金融全球化继续以这种速度发展,25 年之内就能完成全球化。而贸易全球化的实现则可能需要 40 年以上的时间,而且其前提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没有任何人为障碍,并且世界贸易组织的千禧年回合如计划的那样得到启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

全球化的不对称性

全球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当商品、服务和资本的市场一体化以充满生机的步伐向前迈进的时候,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罗伯特·里齐(Robert Reich, 1991)由此问到“我们是谁?”并得出了结论:当世界上除了不可贸易的土地之外的大多数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工厂、资本品等)都可以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生产要素只剩下劳动力了。劳动力全球化的进程非常缓慢,在很多时候甚至毫无进展。因此,在里齐的问题中,“我们”指的是工人,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正在变成全球的了。

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在近几年处于停滞状态,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也进展缓慢。要拉平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移民不是最佳的方法,但却是最快的方法。劳动力流动的缓慢状态拉大了人均收入的差距。在 1870—1914 年的第一轮全球化浪潮中,有 6 000 万人口从欧洲迁移到美国。当时全世界人口总量为 15 亿,而移民总数超过 1 亿,占总人口的 6.7%。

当今的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要小得多。现在全世界人口达到 61 亿,而移民只有 2 亿,占总人口的 3.3%,只有上一轮全球化时的一半。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展缓慢一方面是控制移民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和教育的障碍也是重要原因。2000 年,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为 3%。合法移民最多的是大洋洲,占总人口的 19.1%。移民在北美占总人口的 13%,欧洲占 7.7%。拉美的移民最少,占总人口 1.1%,亚洲为 1.4%,非洲为 2.1%。2000 年,欧盟国家 7%的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的。在 2 700 万外国人中,1 000 万来自其他欧盟国家,另外 1 700 万来自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移民达到 3 500 万,占总人口的 12.6%,他们大多来自拉美国家。

经合组织国家由于老龄化的加速,未来几年移民可能会有显著增加。2004 年,经合组织国家人口年龄的中位数是 39 岁,到 2050 年很可能会上升至 50 岁。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年龄的中位数目前是 24 岁,到 2050 年只会上升至 35 岁(United Nations,2005)。这种情况急需一个国际机构来引导不断高涨的移民潮。移民接受国也需改善移民的待遇。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目前这一轮全球化较 20 世纪初的上一轮全球化拥有更坚实的基础。那时,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只是少数,而今天有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对全球贸易和金融开放。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全球经营的企业得以开展前所未有的整合。互联网使市场能够将消费者和生产商更快地联结在一起。技术进步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使交易、结算和支付的速度得到了惊人的提高。例如,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额在 30 年间上升了 200 倍,从 150 亿提高到了 3 万亿。如前所述,虽然今天的资本净流量较 20 世纪初未有增长,但由于信息技术的运用提高了资金周转率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外汇、债券、储蓄和股票的总流量呈指数增长。

今天的全球化比上一轮全球化拥有更广泛的制度保障。当今世界既有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之类国际组织,也有日益发展的跨国公司和全球金融机构,它们的存在使全球化潮流很难被逆转。

保德、艾肯格林和欧文(Bordo,Eichengreen and Irwin,1999)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已远不同于 20 世纪初。部分原因是民主的进步使人民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化本身的特征也改变了。今天的一体化程度比一百年前更深更广了,国际贸易占产值的比重更大了,贸易和投资延伸到了诸如零售业和那些在一战前封闭的公共和私人服务领域。虽然外国直接投资还未达到之前的水平,当今世界的金融一体化程度远比以前为高。最后,这些经济学家相信,大可不必顾虑贸易全球化引起的紧张和金融不稳定性。在 20 世纪初也有这种情况,甚至更严重,而当时的全球化程度比现在低。